

俄国、原子与西方

乔治·凯南著

(内部读物)

世界知识出版社

俄国、原子与西方

〔美〕乔治·凯南著

何 新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9年·北京

出版者說明

本書作者乔治·凱南是美国职业外交家。1926年进入外交界，1933年开始在美国駐苏大使館工作，1935年被提升为美国駐苏使館二等秘書。1943年曾任美国駐欧洲諮詢委员会代表团顧問。1945年任美国駐苏使館公使銜参贊。1947年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計劃室主任，1949年任美国国务院顧問。1952年任美国駐苏大使，同年10月因发表反苏言論被苏联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回国后在普林斯敦高等研究所当研究員。从1954年起先后又任普林斯敦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教授。

凱南在苏联多年，写过不少关于苏联的書，在西方国家中被称为“俄国問題专家”。1947年他曾在美国“外交季刊”以X的署名发表一篇文章，鼓吹“遏制”政策，对美国外交方針发生了一定的影响。凱南一度参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曾是杜魯門主义和馬歇尔計劃的主要策划人之一。他的言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美国的輿論和外交政策。

本書是凱南1957年在英国广播公司播讲的講演稿，書中最后一章是后来补写的。作者在本書中对当前国际問題的看法同过去的論点基本上一樣，对苏联也仍然是进行恶毒的歪曲和污蔑。但是在社会主义陣营日益強大的现实面前，作为美国統治集团的一个忠实的策士，凱南不得不对当

前美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一些新的看法，例如关于东西方在中欧地区“脱离接触”以减少冲突的可能等。这些讲演发表后，在西欧和美国曾引起广泛的注意。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美国外交政策的动向，我们特将本书译出供读者参考。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俄国内部局势	3
第二章 苏联心理和世界现实	14
第三章 东欧和中欧问题	26
第四章 军事问题	39
第五章 非欧洲世界	50
第六章 加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目的	63
第七章 英美关系	75

前 言

这几篇講稿是在挪威沉悶的歇暑日子里动笔的。当时作者恬靜自适，沒想到入秋以后国际局势会那样风云多变，而講演就是要在那种气氛中作出；同时也沒想到这些講演会受到听众那样的注意，他們显然渴望着論述这种形势的講演。結果临到講演的日子，每篇講稿都不得不彻底重写，以适应当时人們最关心的問題。

每一个曾經在政府計劃部門那种比較規律的气氛中工作过的人，都可以經常得到专家的帮助，同时对于所处理的問題至少能拿出大部分专业時間和精力来加以研究；这样的人在退休后以个人的身分談論只是从报纸上得到一些皮毛知識的問題，总有一种偏促不安的情緒需要加以克服。現代生活中其他許多事情所遇到的問題在这里也出現了，這個問題就是专业知識和一般人的理解之間存在着不可避免的距离。当这些講稿付印时，我非常明白我所談的問題自己都了解得很少。我曾經不得不一再反問自己，我公开談論這些問題是不是應該。

有些人認為外交事务是职业外交家們独占的天地，在这里无公职的公民的意見不可能有什么价值，这种看法我无意接受。即使这种說法大部分正确，承認这种說法也会把我們帶进政治现实的一种新的領域，而这种領域是我們的政治制度和思想习惯都不能接受的。所以現在至少在还有

人願意听的时候，一个公民还是必須努力思考，想出意見并把它发表出来。

当然，这里所談的每个問題，在我們的政府中都有人对它有更詳尽、更新穎的了解。此外，英国广播公司虽然极富于寬容精神，但作广播講演的人不能完全不考虑半小时广播的严格限制。要把想談的内容分成若干不长不短的段落，就不可避免地要在这里或那里产生不自然的現象。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我就不能保証自己所說的一切都是充分的和正确的。其中有些部分材料缺乏，有些构思不完善，还有一些則残缺不全。我决不打算把这些意見推荐給政府作为完美的行动方針。我在这里所要提出的不是政府应当如何做，而是应当考虑哪些問題。这些講演中的任何成分，如果要成为政府行动的依据，必須經過仔細研究和提炼，而这些工作唯有政府的負責部門才能办到。

但事实仍然是：当这一系列講演开始时，国际局势比任何时候都暗淡；并且，依我看来，官方和公众对国际問題的討論所采取的形式，也从来没有这样郁悶、僵硬和悲觀。假如我所說的一切能够使这方面的討論緩和下来，使大家注意到我們自己疑神疑鬼和庸人自扰的問題，并使人們对于苏联拥有原子武器的問題能安下心来，我将十分虛心地欣然接受这些講演所应受到的認真的批評。其实对苏联拥有原子武器的問題，唯有坚持不單純从軍事角度来看才能得到解决。

乔治·凱南

第一章 俄国内部局势

十年前，我曾偶然給美国“外交季刊”写过一篇文章，后来人們把它叫做“X論文”^①。它受到新聞界的重視远远超出我对它的估价。这篇文章談到的是苏維埃政权的性質和它向西方社会提出的問題。

最近几个月来，許多人都問我現在对这个問題的看法如何，問我对于应付这个問題的前景是不是仍然抱着1947年那种充滿信心的看法。这是一个很大的問題，我无法在这些簡短的講演中作出詳尽的闡述，而只能大略提一下其中的某些个别方面。好在目前似乎正适于作这种討論，因此那怕談一些粗淺的感想，也不是沒有好处的。

我首先要談的是苏联内部的局势和它对我們的意义。

十年前我写那篇“X論文”时，不得不指出苏联經濟发展中所存在的困难，如战时的巨大破坏、苏联人民身心方面的极度疲憊、經濟发展仍然存在的不平衡性，以及农业的悲惨境况。

現在我可以坦率地承認，在我写了那篇文章以后的这些年中，苏联的經濟发展虽然困难重重，但它的成就仍然超过了我当时認為可能的程度。在短短的十二年中，苏联人民不但从战争的巨大創伤中恢复过来，而且实行了一个工业

① 該文凱南用的笔名是“X”，因此后来被称为“X論文”。——譯者

化計劃，使俄国在工业总产量方面仅次于美国，在軍事物資方面据說已經和我們不相上下了。最近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事实虽然只是一种戏剧性的手法，在某些方面会让人发生錯覺，然而它在別的一些方面却向人們說明了这一巨大的經濟成就。

我們虽然应当为这一成就对苏联人民和他們的領袖充分表示应有的敬意，但是也不能夸大它的意义。当苏联在經濟上获得这种发展的时候，其他国家的經濟也在迅速地发展。比如我国的生产力在战后时期的增长，从絕對值上看来，可能比俄国还要大。

俄国逐年的相对增长率比美国大，这当然是事实。如果这种趋势无限制地繼續下去，俄国人最后就会在許多东西的产量上赶上并超过我們。

但是实际上，我認为苏联經濟的增长率很少可能长期保持現有的速度。直到目前为止，俄国一直拥有工业化早期所具有的許多迅速增长的可能性。可是它的經濟現在正在进入成熟阶段。它将遇到其他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經常发生的問題，如組織問題、人力問題等等。到現在为止，我們还没有証据可以証明它比我們当中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更好地解决这些問題。

我們也必須記住，普遍不平衡的現象始終是苏联經濟发展的特点，这种現象到現在还没有完全解决。直到現在，苏联經濟的进展實質上主要只代表軍事工业建設計劃的實現。这方面的成就是依靠严重地忽視其他經濟部門，甚至剝削其他經濟部門并不断压低生活水平之后才获得的。特別是农业，在整个斯大林时期，曾极其严重地遭到忽視和摧

殘。斯大林的繼任者們雖然確實作了許多努力來糾正這些摧殘行為，但在我們中間，頗有些人並不相信他們對這個問題已經得出正確的分析，也不相信他們準備為解決這個問題創造出先決條件。蘇聯在農業上一直實行集體化，而在一個大國中發展農業資源，這究竟是不是一個實際可行和有希望的方法還有待事實證明。從衛星地區的經驗看來，肯定不能證明這一點。甚至在蘇聯，集體農莊制度現在也必須採取我們美國人稱之為“耕種久旱區域”的作法作為輔助手段，而我們現在已經認識到，這是一種眼光短淺毫不足取的作法。

過去二三十年来，蘇聯在計劃和實行經濟發展時，如果保持正常的均衡（或者我們所認為的正常均衡），我認為單就它的工業部門的發展來看，同其他處於相似工業發展階段的國家比起來是否能算特別快一些，就很成問題。我們常常忘記，俄國的工業甚至在革命前就已經在迅速地發展，不過那時的发展完全是在不同的制度下進行的，而且也沒有蘇維埃政權強制發展所造成的困難和畸形發展。

儘管存在以上這些問題，俄國近年來所獲得的成就仍然是十分驚人的。如果沒有不可預見的偶然原因，我認為這種情形在將來還會繼續下去的，只是速度較慢一些而已。

讓我們看一看俄國國內的政治局勢吧，在這方面情況就遠沒有這樣穩定了。這裡出現了兩個重大的問題。一個是最高集團成員中的權力分配和權力經常從一部分人手中轉移到另一部分人手中的問題。另一個是滿足下面人民的要求，特別是學院中青年和文化界知識分子要求更大的思想和言論自由的問題。我們可以看到，前者是政權中最上層內

部的关系問題，后者是政权和人民之間的关系問題。

目前，这个政权的上层的形势具有这样的特点，即近年来在苏維埃体系内部，共产党并不是謀求个人权力、地位的唯一途径。工业管理部門和軍事部門在許多方面都能提供比正規的党机构还要富有吸引力的事业前途，科学界和工程界的情形在某种程度內也是这样。这些党外的专业同共产党的联系非常松弛，只是靠其中少数高級人物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或主席团等最高决策机构中的成員身分来维系。

斯大林逝世后最初一段时期，赫魯晓夫不得不广泛地和这些党外团体分享权力以巩固其个人地位，并撑持住政权体系以应付由于斯大林逝世而带来的打击。最近，他正在設法摆脱这种可厌的伙伴关系，重新树立党对一切专业机构的明确的领导地位，此外，还在加强他个人在党内的地位。假如他在这一切方面获得成功，許多方面必然会恢复某种形式的斯大林主义，只不过少了秘密警察的恐怖罢了，这一点至少到目前为止是沒有了。現在，赫魯晓夫在許多这类举动中已經获得了表面上的成功，排斥朱可夫只是最近和最重要的一次。但这种成功是付重大代价后才获得的。現在俄国站在共产党机构之外的人才远比党内的多。赫魯晓夫現在接二连三得罪了知識分子、工业管理人員和一部分武装部队的軍官，使他們和中央政权机构疏远了。他現在已經登上了权力的最高峰，显然这正是他所希望的。但是我猜想他高高在上是頗为孤立的，而且周围的风也日益寒冷。显然这并不是一个很稳定的局面。同时除非对这些党外专业团体在政府主要部門中的代表問題作出妥善的安排，否則我

們很難看出怎樣能獲得真正穩定的局面。如果做到這一點，黨的傳統地位又將怎樣呢？蘇聯的領導人在這裡感到徬徨了。他們要不然就得跟上時代，改變制度；要不然就得回到僵硬的斯大林主義，但這樣做代價必將越來越大，而且最後將傷及制度本身的健全。

政權當局與人民之間的关系也存在着這種左右為難的情況，其程度甚至更為明顯。近幾個月來，討論蘇聯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不穩狀態及其原因的文章已經發表了很多。許多評論家正確地指出，蘇聯政府在這方面的困難是他們自己造成的。由於他們那種令人羨慕的、在許多方面也是充分值得我們欽佩的普及教育計劃的結果，他們創造了一個新型的受過教育的階級，但是，這個階級干脆不打算再接受共產黨那套控制思想的老辦法，而決心要獨立思考。在這些人中，正象在俄國文化界的舊人物中一樣，現在存在着一種強大而事實上又無法壓制的要求，要爭取知識和文化方面的完全自由。

斯大林的后繼者們想要消除斯大林無情地壓制文化與藝術活動的某些惡果，最初會對知識分子的情感作了一些讓步。但讓步的效果主要只是把這些人的不幸完全暴露出來，同時也暴露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對於這些人的思想和創造欲是多麼驚人地失去了控制力。蘇聯領導人看到這種情況大為驚恐，最近手忙腳亂地力圖對文化生活重新加上老一套的斯大林式的控制，恢復原來的樣子。但這樣，肯定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人們的思想一旦提出麻煩和深刻的問題以後，想再要把它拉回來就范，就為時太晚了。如果蘇聯領導人打算沿着壓制的道路繼續發展，那只會使知識

分子完全离心离德，并且失去知识分子的合作，而这种合作在维持广大人民的民心 and 爱国热誠的事业中是不可缺少的。但从另一方面說来，他們如果打算进一步滿足人民中受教育阶层的真正要求（这些也日益成为广大人民的要求），那我就敢保証，不达到完全的文化自由是无法停止的。然而共产党的統治是不是会容許这种完全的文化自由呢？关于这一点，共产党人自己在許多地方都已經提出否定的答复。

因此，我們必須認識到，俄国国内局势是一幅錯綜复杂的图景。经济发展的确是事实，但它是在政治战綫上危机日深的背景下取得的。这些危机包括領導人物相互关系上的危机，他們和被統治的人民的關係上的危机。不錯，后一种危机只是一种緩慢的危机，很难在明天就爆发。但是这是一种严重的和合乎邏輯发展的危机，要解决这种危机，除了完全的文化与政治自由以外，很难再找到其他的途径。

俄国国内现实的这种性質對我們西方人說来究竟有什么意义呢？讓我們先談談它的经济发展吧。当然，苏联政府一向是抓住一切机会极力利用这种成就来为政治目的服务的。他們利用一切机会力图把自己說成是在同西方国家全力进行一場工业发展的竞赛，然后把他們每一点经济发展都解释为自己經濟制度的胜利和西方国家的失敗。我国有許多人，其他国家可能也有許多人都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苏联的这一論調，相信苏联的每一次成功都必然意味着我們的失敗，而且認為我們的得救取决于我們是否有能力在俄国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中都超过俄国。

我必須說明我的看法完全不是这样。俄国現在正在迅速进行工业化这一事实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过去几个世紀，

俄国的发展是落后于西方各国的；然而它有精力充沛的广大人民，而且他們在各方面都富有才能；它的領土內資源丰富，可以使工业化在各地得到成功。有了这些现实条件和我們这个时代的精神，如果俄国人民現在还不能迅速地使自自己的国家工业化，那倒真比今天发生的情况奇怪了。

对于俄国人的这种成就，我并没有什么嫉妒的意思，同时我也实在看不出这对我們解决自己的問題有什么妨害。如果苏联喜欢把自己描繪成是在拚命同我們进行一場經濟竞赛的話，那我看不出我們有什么义务要接受这种解释。人們有时会得到这样一个印象，認為赫魯晓夫先生把国际生活看成是一个大运动会，全世界都在作壁上观，同时他們和我們在这一場比賽中所爭夺的目标，是由他們而不是由我們規定的。

比方說，苏联报纸沒有一天不在号召人民在肉类、乳品和黃油的产量按人口平均計算方面赶上或超过美国。可是我根本不能承認我們是在进行这样一种竞争。在美国，这些东西已經足够了。我們的問題根本不是怎样去更多地生产这些东西。我倒希望不久的将来俄国人民在这些方面和其他消費品方面也能滿足他們的一切要求。至于产量按人口平均計算究竟是比我們多还是少，在我看来是完全沒有关系的。

我認為当他們也作到这一步之后，就会和現在我們当中的某些人一样，将发现这并不是一切問題的最終解决，同时会发现有了丰饒的物質財富以后，現代生活中最严重的問題才开始出現。

当我一想到莫斯科人民今天对于經濟发展的热誠时，

就使我回忆起自己青年时代在美国中西部的情景，同时也使我想到我们当中许多人那时对那个区域的经济迅速发展所感到的过分高兴。我们美国人被人看成是二十世纪初期的“巴比特”^①，我认为我们当时的确是那样。但我们中间至少也有许多人认识到这种人生观的肤浅，并且造出这个名词来讽刺这种现象的倒底还是美国人。现在俄国人是二十世纪中叶的“巴比特”了。而且一直到現在，由于他们是忠实的唯物主义者，就仍然沒有认识到这种观点的局限性。

如果他们解决了自己的生产问题，并且能和我们共同来解决更深刻更微妙和更有意义的问题，那才是一个皆大欢喜的日子，可是这些问题存在于令人迷惘的经济计划的末端，而不存在于它的开头。

我国同胞当中有许多人对于这一看法也许会提出这样的答复：“你所說的这一套也都不错，但是我们对苏联经济发展中的军事工业又该怎么办呢？难道不是我们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吗？”关于这一问题，下面我还要比较详细地談談，这里我只想說明，我很难理解人們为什么要把苏联在经济或科学方面的每一进展都看成是对西方安全的一个新的威胁。有时我不禁要問，人們究竟到什么时候才肯認識到这一事实：現在世界上有相当多的人有使其他民族遭到可怕的毁灭的能力，而且这种危险已经是如此之大，以致这种危险究竟是更大或更小一些已經没有什么意义了。

对于我們的苏联朋友——如果有意毁灭我們的話——究竟能使我們毁灭七次，还是四次，我並沒有多么大的兴

① 辛克萊小說中的人物，是一个庸俗的中产階級地產商，对一切問題都是用他那个階級的市儈眼光来观察。——譯者

趣。同时我也不認為对付这一危險的方法就在于无限制地增加我們的使他們遭到可怕的破坏的能力。我們的問題已經不是怎样去防止人家获得破坏我們的力量，想防止已經来不及了。我們的問題倒是怎样使他們沒有毀灭我們的意图或动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們当然要保存和培植我們的威懾力量。但是这一任务是有限度的，并不是无限度的，而且这一任务也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同俄国人在工业与科学方面进行无止境的竞赛。

性急的人們也許又会說：“說得对，但是如果俄国人在經濟发展的竞赛中跑到我們前面去了，世界落后地区的人民要找經濟上的导师，就会把眼光轉向他們而不轉向我們了。到那时我們又将何以自处呢？”这一点也是我在以后的講話中要談到的問題。

在这里我要先指出一点：如果我們假定自己的安全必須依靠把苏联永久排斥出去，讓他們无法对落后地区負担起現在一切工业化国家对落后地区提供这类援助与指导的責任，我看这是一个危險的假定。我相信人們有許多东西要向苏联学习，同时也有許多东西要向我們学习。我們的經濟体系是以法治和商业傳統的特点为基础的，在許多方面这种經濟体系对于解决其他地方的人民的問題并不完全适合，而俄国人倒可能比我們提供更多的东西給他們。但也有我們可以有較多貢獻的地方。这些事情必須讓它們象求得的平衡一样自然地得到解决。能够做到这一点，我相信我們彼此就都有机会和工作了。

事实是这样：我們西方人当然正在和俄国人进行一場竞争。但这种竞争并不是俄国人所說的那种竞争。我們所追

求的目标不相同,我們的发展阶段也不一样,我們的任务是不同的。真正的竞争倒应该看看我們当中究竟誰能最快和最成功地解决本身的特殊問題并实现自己特有的理想。我国人常常問我,为了防止苏联的威胁最好从哪里着手,对于这一問題,我总是回答說:最好从补救美国人的缺陷,从改革我們自己認為可耻或使我們感到煩惱的事情着手。比如我国的种族問題、大都市的情况、青年人的教育与环境問題、专业知識和一般人的理解之間的距离等等。我想西方其他国家的情况也是这样的。

需要补充指出的是:这些問題并不会由于我們或任何其他的人在同温层里做出的什么事情来解决。如果这些問題要找到解决办法的話,那只能在我們这个熟悉的大地上找出来,也就是說只能从人与人之間的关系中找到,从个人心中的道德斗争中找到。如果叫我在发射人造卫星和繼續注意地面上更加熟悉的問題两者中間任择一个的話,我就要一百次地表示选择后者。因为我們如果在解决地面上的問題中得不到这种进展,什么卫星也救不了我們。我們能不能战胜俄国人的問題,基本上就是我們能不能战胜自己的問題。

我們对俄国經濟进展的反应只談这些吧。至于我們对苏联领导人所处的政治困境的反应,需要防止另一些危險。由于他們的問題并不是我們的問題,我們大可不必把对方的失败当作自己的胜利。我們对于自己在工业时代的政治生活問題,並沒有找到圓滿的解决方法。此外,我們也不要忘記,苏維埃統治下的人民的幸福也决定于这些問題的解决。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幸福在某种程度內是密切相关的,